

风雨 故人来



杂家杂忆丛书

冯英子 著

1061
2011
杂家杂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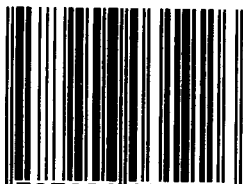
风雨故人来

冯英子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ISBN 7-80603-192-8



9 787806 031926 >

书 名 风雨故人来

著 者 冯英子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地址: 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 253006)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 (787×1092 毫米)

9.125 印张 25 幅图片 150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192-8/Z·26

定 价 1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冯英子 (1915, 2—), 当代著名记者、杂文家。生于昆山。家贫失学, 1932 年入《昆山民报》为记者, 后任《新昆日报》编辑。1934 年为苏州《早报》记者, 兼编《大光明报》、《小早报》, 1937 年为《苏州明报》记者, 上海《大晚报》驻苏记者, 上海《大公报》记者。1938 年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干事, 国际新闻社记者, 成都《新民报》驻汉、驻渝记者。1940 年为邵阳《力报》主笔, 桂林《力报》总编辑, 衡阳《正中日报》评论部长, 吉安《前方日报》、沅陵《力报》、《中国晨报》等总编辑。1946 年后, 为南京《中国日报》总编辑, 《新中华日报》总经理, 苏州《大江南报》社长, 吴县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1949 年后, 为香港《星期报》、《周末报》、《文汇报》总编辑, 1952 年回来, 为上海《新闻日报》编委, 《辞海》编审,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1993 年离休。著作已超过二千万字, 有《冯英子杂文选》等十几种。

目 录

- 1 春兰秋菊王造时
- 9 忆储安平先生
- 20 柳亚子先生二三事
- 26 教授无恙乎
- 29 遍插茱萸少一人
- 40 老将风范
- 51 悼刘尊棋
- 58 哭怪愚
- 82 富贵难移的聂绀弩
- 89 荃麟啊荃麟
- 97 不尽长江滚滚来
附：悼长江（诗）
- 105 只有香如故——关于瞿白音
- 114 从陈农菲到陈同生

124	枫落秋江冷
131	《孟秋江文集》后记
137	望滴水兮哭秦似
144	千秋俎豆存典范——记魏克明
152	红羊劫里可怜生——记张稚琴先生
169	忆邓季惺大姐
175	一生坎坷金家凤
186	许宪民二十年祭
203	观旧照思丹娜
211	迈进，你一定还记得
221	严肃，你在哪里？
228	祭文华
231	白雪飘飘
237	怀勾适生先生
241	顾希今与《力报》
247	不忘康德
256	送欧阳敏讷
260	符号人生
265	仗义胡星原
272	《湘水滔滔》泪滔滔
278	忆高旅
282	后记

春兰秋菊王造时

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苏州。有一天，当时上海《大晚报》的邵宗汉先生来找我，他约我为《大晚报》采访“七君子”的新闻。这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毫不推辞，欣然同意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同王造时先生的相识，倒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他是“七君子”之一。我去苏州高等法院的看守所探望他们，还去旁听了高等法院对他们的公开审讯。“七君子”在看守所中那种从容不迫、镇静自若的精神，“七君子”在法庭上那种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态度，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在那中华民族将亡未亡的日子里，在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环境中，“七君子”的活动，使人发聋振聩，觉得非救亡不足以图存，中国人民再不起来自救，那么亡国灭种的危险，



王造时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中为王造时夫人朱适芳，右为彭文应。

即在眼前。苏州这个江南的古城，也因“七君子”事件出现了更多的生气，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开花。

造时那时三十三岁，他矮矮的身材，胖胖的身体，圆圆的脸庞，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不慌不忙，很有一点学者的风度。一上法庭，他口若悬河，根据当时的法律条文，把法官驳得瞠目结舌，无法回答，而且也常常赢得旁听者热烈鼓掌、由衷欢迎。那时国民党政府控告他们是“危害民国”，每开一次庭，旁听

者都清清楚楚懂得，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每一次开庭，都使庭长和法官狼狈万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在法庭上，受审的不是“七君子”，而正是他们自己。记得有一次，宋庆龄、陈波儿等代表人权保障同盟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法院院长只好避不见面。

七七事变之后，“七君子”被释放出狱，造时成为当时的名人，他到处发表演说，号召团结抗战，一直到上海的退却。那时熊式辉在做江西省的主席，办了一个政治讲习所，因为造时是江西安福人，所以把他请回家乡，去这个讲习所做教务主任。南昌不守，江西省政府迁到泰和，造时则回到吉安，办了一份《前方日报》。我同造时比较熟悉，则是从《前方日报》共事开始的。

1941年的夏天，我在桂林《力报》工作。有一天，造时忽然来找我，他带来了范长江的介绍信，约我去他的《前方日报》。既然有长江的介绍，我当然同意了。但在我前赴吉安经过耒阳的时候，却让另一个朋友拦住了。“啊哟，王造时那个人刻薄透了，你怎么可同他合作？”他拖着我不放，把我拖到衡阳，也终于拖回桂林。

直到太平洋事变发生，长江从香港脱险回到桂林，我们谈起此事时，长江认为：按照战局的发展，日军可能要打通粤汉路，切断我们东南与西南的通

道，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倘然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吉安可能是东南地区的一个中心，一个敌后游击区的重要据点，去那里支持一张报纸，是有意义的，不应当去考虑王造时的个人作风。经长江这么一说，我决定去吉安同造时合作了。

那次我在《前方日报》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离开了吉安。通过这一年多的合作，对造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又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了一个时期的国际问题，1930年回国之后，以还不到三十岁的年龄担任上海光华大学的文学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学政治，当然离不开政治，他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民主；他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团结抗日。他办杂志，写文章，发表他的政见。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把光华大学的文学学院院长搞掉了，他挂牌做律师，包打民主官司。最后，也终于成为名闻全国的“七君子”，被国民党投进了监狱。

但是他并没有屈服，还在继续战斗。我看过他不少翻译作品，他好像很欣赏、也很推崇英国拉斯基的作品，在伦敦大学时，他听的就是拉斯基的课。拉斯基是英国费边社的委员，费边社推行的缓进主义，实际是一种改良主义。我觉得他那种慢条斯理，不急不忙，遇事沉着的作风，可能也正是受了拉斯基的影响。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尽管他时时不忘那个“博

士”的头衔，每次讲话都要讲一个威斯康辛大学中的笑话，但他毕竟是一个书生，一个学者，一个热爱自己国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客厅中，来往的也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记得余精一教授、孙席珍教授、潘大逵教授，当时在吉安办农场的胡兰畦女士，办农校的彭文应先生等等，真有点“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味道。特别难忘的是，那时国民党的反共已经进入第三次高潮，空气是严峻的，但是在他的客厅中，大家都议论纵横，无所顾忌，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这里却依然是春天。

造时是有一点“刻薄”，比方说，在《前方日报》社中，信封每次只能领五只，领一支新笔要用旧笔去换等等，这些都是他做报社经理大人的“杰作”，很挫伤了一些同事的心，把账一古脑儿都算在他身上，不少人都说他“刻薄”了。其实造时虽然也精打细算，但说好了的事，他是一定兑现的，我倒以为这是他在外国多住了几年的影响。至于报社中的那些规定，平心而论，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不

对。

那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争论，有吵架，我那时还不满三十岁，年少气盛，有时可以拍着桌子骂他，他却依旧对你笑嘻嘻的，不作一声。一直等你脾气发完之后，才对你心平气和作些解释。因此，我也确实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前方日报》的同人中，

我和他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的。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在上海碰到了他。那时不知他用什么关系弄了好几处房子，还办了一个“自由出版社”和一个“前进中学”。我家在苏州，也在上海的民治新专教一点课，每次到上海，“自由出版社”楼上就成为我的宿舍。我们还计划过几次合作，一次是他介绍我去南洋搞一家报纸，我估计领出国护照不易，没有同意；一次是打算合办一个刊物，由他做发行人，我做编辑人。但也正像他的“缓进主义”一样，谈了好几个月，依然未能实现。那时形势发展很快，我离开上海，跑到香港了。

1953年我回到上海，造时当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一个什么委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书，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场所见面。后来由于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他迁入茂名路的十八层楼。因为住得近，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记得1956年时，他去北京参加了一次会议，回来之后，特地约我去文化俱乐部吃饭，他告诉我在北京见到总理，总理认为“救国会”这个名义，还可恢复活动。他征求我的意见，并且拉我合作。我除了搞报纸之外，对这些兴趣不大，何况早期我也没有参加过救国会，所以拒绝了他。

然而谁想得到，1957年的那场反右斗争中，“恢复救国会”竟成为他被定作“右派”的主要罪状，而且从此他一跤摔了下去，真正的不得翻身。接着而来

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更把他说成是什么“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屈死于看守所中。

这样一个人竟然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尽管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也是难于想象得到的。特别是造时的身后萧条，更出于人的想象之外。他有四个子女，其中三个都由于精神分裂症而去世，最小的一个女儿，因为不要听对他父亲的“批判”，也成为“右派”，十年大乱中，这个本身也做过“右派”的“右派子女”，当然更难逃此劫，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最后死于乳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这是造时留下来的唯一带点血缘的后一代。别的人屈死之后，还有人人为他呼吁，为他奔走，而造时呢，连这一点权利也没有，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么？

听说造时因被当作反革命集团成员而被捕、而去世的消息之后，我一直为之不安，翻翻他生前写的那些文章，特别是那些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祸国殃民的文章，回忆他当年在苏州高等法院中那种英雄不屈的气概，回忆在吉安、在上海我们相处的一些日子，我坚信泼在他面上的一切污水一定会最后洗清。这么一个在民主革命中奋勇争先，跟着共产党走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现在，不仅他在十年大动乱中的冤案已得到了平反，1957年的“右派”也经党中央下令改正了。“七君子”虽然大多数已亡故了，然而在中国人民前进的历程中，“七君子”

依然是一个光辉的名字，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这中间当然也包括着造时。

我不相信人死了之后还有灵魂，但我相信人死了之后还会留给人以印象。造时生于1903年8月1日，死于1971年8月5日，他整整六十八年的生命中，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朋友中毁誉不一，但他无愧于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想，倘不是这场浩劫，他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更多工作的。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是《楚辞·礼魂》中的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这么多的折磨和迫害，但是他们的思想还会留在人间，他们的名字也将留在人间，“长无绝兮终古”，王造时，这个30年代的“七君子”也将是其中之一。

忆储安平先生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寄给储安平曾经工作过的报纸，过了几月，杳无音讯，于是我给总编辑先生写了封信，问他是不能登、不想登还是别的原因。过了几天，总编辑先生把稿子退还给我，没有写一个字。这是不表态的表态，我当然懂得。后来，有一位朋友见义勇为，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同储安平有点关系的一家杂志，可是也是石沉大海。做了几十年的“右派”，受尽折磨之后，谁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可是连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也难于用出，则是出乎想象之外的。

为什么不能用、不提一提储安平呢？我自然也心照不宣。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既然不能纪念他，我也只能把他设法忘却了。我同储安平淡不上有什么深厚的交情，只是彼此踽踽独行在人

